

编号

日本问题研究参考资料

(合订本)

编印单位 吉林大学

材料时间 八〇 年 月 日

军事学院军事资料室

一九八 年 月 日

书号	J25
号	19.1
军事资料室	

1/13

2

90

内部刊物
只供参考

日本問題研究參考資料

一九八〇年 第二期

(总第三十四期)

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

一九八〇年四月

编者前言

本期为明治维新史问题的专辑，转载了反映日本学者有关这一问题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动态的论文、报告共七篇。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开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明治维新史是一百多年以来最引人注目、研究得最深入的一个领域；同时它也是日本历史学上成果最丰盛的一个领域。为要开展日本近代史研究工作，痛感有必要系统地搜集、研究日本历史学界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动态。这几篇材料，就是我们在学习日本近代史的过程中选译出来的。

《明治维新》一文，是选译自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光贞编的《日本史入门》（有斐阁丛书，1975年）。该文是在总结有关明治维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极简明扼要地叙述了明治维新的过程和历史意义。该文篇幅虽不大，但却概括得很简明，也富有启发性。

《关于明治维新史观的演变》一文，则结合日本近代史上阶级斗争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对各个时期的互相对立的两种维新史观、它们之间的对立和联系以及怎样演变等，作了较系统的评介。该文虽然只限于明治维新史观的这一角度，但对我们了解明治维新史学史，还是很有帮助的。

《关于明治维新研究的历史》一文，简明而全面地介绍了一百年以来的明治维新史研究情况，重点评介了“讲座派”和“劳农派”之间的著名的“日本资本主义论争”。该文结合有关具体研究

成果，对两派的主要论点一一作了评介；同时，还介绍了两派史学观点在当代的发展。这篇文章和上一篇文章，分别译自冈田章雄等编的《日本历史》（第10卷和第13卷，读卖新闻社）。

《对于明治维新应该怎样评价？》、《变革的各个时期和各阶级》、《幕藩政权的崩溃过程》和《统一国家形成的特点》等四篇报告，是选译自池田敬正主持的《座谈会日本历史（15）明治维新》（学生社，1977年）一书。它们集中地、系统地反映了当代日本历史学界三十年来对明治维新史在各个方面的研究情况。这四篇报告，对于我们了解日本当代学者对明治维新史观、明治维新史的原因、历史分期及各个时期的经济、政治的情况和阶级关系，幕藩政权崩溃过程中的公武合体运动和尊王攘夷运动、倒幕运动，明治维新和人民运动，明治政权的性质，日本当时面临的历史课题、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维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最新动向，都很有参考价值。

最后，《战后日本》一文，系译自横田健一编的《要说日本史》（创元社，1978年版）。该文仅用一万字的篇幅，按自己的观点，简明而全面地概括了到1978年为止的日本当代史，很值得一读。

当然，这些文章、报告的史观和学风是各式各样的，读者阅读时请注意。由于手头资料的不足和翻译水平有限，选材、译文定有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正。

目 录

编者前言.....	(1)
-----------	-------

明治维新.....	(1)
-----------	-------

关于明治维新史观的演变.....	(8)
------------------	-------

关于明治维新研究的历史.....	(20)
------------------	--------

对于明治维新应该怎样评价?	(24)
---------------------	--------

变革的各个时期和各阶级.....	(31)
------------------	--------

幕藩政权的崩溃过程.....	(37)
----------------	--------

统一国家形成的特点.....	(47)
----------------	--------

战后日本.....	(55)
-----------	--------

明治维新

鸟海 靖

一、关于明治维新的各种见解

在日本近代史上，明治维新是最引人注意、也是研究得最深入的一个领域。不用说，这不外是由于明治维新是构成近代日本出发点的重大变革的缘故。但是，对于明治维新的本质，到目前为止还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看法，在见解上却不一定都是一致的。

对于明治维新的历史意义的评价，早在明治初期，就表现在政府的王政复古的史观——把明治维新看作是原来意义的国体的、“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恢复——上了。当然，这是明治政府为要从历史意义上，赋予自己以正统性而作出的；但却在这种观点指导下，从明治末期以来所进行的正式的维新史料编纂事业，根据搜集来的庞大史料，曾作出了许多卓越的实证的研究，也是不能否认的。

另一方面，处于在野的地位，在明治前期的文明史观的影响下，如福泽谕吉、田口卯吉、竹越三义（与三郎）等人那样，对名分论的明治维新史观加以抨击，并按照由野蛮专制转变到文明的潮流的观点，来评价明治维新。

这个文明史观的系谱，自大正时期以来，由本庄荣治郎等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尾佐竹猛的宪政史研究继承下来。特别是后者，对维新按照由封建国家过渡到立宪国家的观点，进行了许多实证的研究。

进入昭和时期以后，依据史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起来，并使资本主义发展史和明治维新史的正式研究深入开展起来了。即说，把明治维新看作是由封建制过渡到资本主义制为基础的、统一的、包括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在内的整个社会结构的变革来加以把握了。而且，众所周知，在他们的内部，“绝对主义的成立论”（讲座派）同“不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论”（劳农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太平洋战争后，建立在战前的理论和实证的积累基础之上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地开展起来了。构成为主流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但战前的讲座派同劳农派之间有关明治维新在本质规定上的对立，仍然继续下来了。即说，继承前者系谱的研究者强调：维新变革的主体势力不是资产阶级；同时，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也没有废除，不过是由全国统一地重新加以改组，而开辟了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的道路；把明治维新规定为自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的过渡时期的特殊政治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确立。与此相反，和后者有联系的研究者却认为：和变革的主体如何无关，由于明治维新成立了使资本主义得以顺利推进的政治权力；由于领主的土地所有制的瓦解，使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土地所有制确立下来；这样，尽管内部的条件不充分，但由于外部的压力，可以理解为是早产的资产阶级革命。

但是，这种有关本质规定上的对立，也可以说，在定义上的差别更大些，但在实际

内容上的差别，却并不那末大。而且，把从一部西欧各国历史事实当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当作一种手段，用来分析在条件上完全不同的明治维新，这种作法究竟是否有效，也颇令人怀疑吧。

如同上述那样，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多或少地要从世界史的普遍法则上，把它作为一个发展阶段来评价明治维新的情况相反，还有这样的见解，即更重视在欧美列强的强烈压力之下，走上民族独立道路的日本独自的条件，用一种民族革命的观点来把握明治维新的。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当中，近几年来重视明治维新在国际上的转机 and 民族的课题的观点，也盛行起来了。

进而，最近还出现了想要按照“近代化论”的观点，要把它作为亚洲国家中在西欧的近代化上唯一取得成功的国家，来重新评价日本明治维新。（注）

二、国际条件

明治维新，是以应付西欧强烈的冲击作为开端的。当然，在幕藩体制之下，作为准备条件的种种内部因素已经有了萌芽，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使这种内部矛盾一举被激发出来，成为直接转机的，却是1853年（嘉永6）的倍利来航所象征的，欧美列强的强烈的压力。

自江戸时代初期以来，在200多年的时期里，日本在锁国体制之下，还在大作太平之梦的时候，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英国、法国、美国等各国在17——18世纪，相继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进而自18世纪下半期至19世纪中叶的期间，又实现了产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增长，使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样，对欧美资本主义列强来说，亚洲作为销售商品和确保原料的市场的的重要性，显著的增长了。

“世界工厂”的英国，在18世纪把法国势力驱逐出印度，并把印度变成了独占的殖民地；对于中国，也以1840——42年的鸦片战争为开端，加紧了侵略。法国自19世纪初开始，在印度支那把势力顺利地扶植起来，中叶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开展了积极的对外政策。在政治、经济上显著落后的俄国，在沙皇制度下推进了富于军事性质的东进政策，在东部西伯利亚和沿海州方面扩张了势力。另一方面，比这些国家稍迟些，美国于1848年在同墨西哥的战争中取胜，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地方，到达了太平洋沿岸，进而越过海洋，对东亚表现了关心。

列强对日本提出开国的要求，也是作为这种“西力东渐”的一环而进行的。首先，以18世纪末的俄国为开端；进入19世纪后，外国船舰相继来航，幕府要继续维持作为“祖法”的锁国政策，也越来越困难了。

在这种形势之下，对日本的开国上，着先鞭的是美国。即说，美国作为太平洋的捕鲸业和横断太平洋、中国航路的中转港口，强行要求日本开港；由于率领军舰再次来访

（注）关于明治维新从何时开始，至何时为止的问题，有好几种见解。首先，关于它的始期，有两种看法：（1）天保年间（1830——40年代）；（2）倍利来航（1853年）。前者重视幕藩体制的内部矛盾；后者则重视国际条件。其次，关于它的终期，也有各种看法：（1）1871——73年的各项改革（废藩置县、地税改革等）；（2）土族叛乱的结束（1877年，西南战争）；（3）自由民权运动的败退（1884年，秩父事件）；（4）帝国宪法的颁布、帝国议会的开设（1889——90年）。

日本的倍利炮舰外交，于1854年（嘉永7）成功地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继此之后，日本同欧洲各国也相继缔结了和亲条约；进而，在1858年（安政5）缔结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以下的各项条约（安政条约），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环而开国了。

在安政条约中最重要的规定，是自由贸易；根据这一点，封建经济体制下的日本同实现了高度发展的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就有了直接的接触。不久，就引起了以“万国对峙”为目的，从商品流通机构起到生产关系止的重大变革。同时，根据这些条约，日本在协定关税率制度、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上，允诺了单方面的义务（继承和亲条约的条款）。进而，在实际上还承认了保持自治行政权的外人居留地的设定及其为了警备而驻留外国军队等；在许多方面，把日本置于了不平等的地位。

但是，在安政条约缔结以后，自夸在对日贸易上占压倒优势的英国，掌握了对日外交的主导权。当时，对英国来说，以世界最大的经济力量为背景，自由贸易的主张占了优势，在对日的基本方针上也放在贸易的自由发展上。从而，对于妨碍它的狂信的攘夷运动，要使其醒悟到一旦使用武力，就要作出反应（1863年英萨战争等），使其认识到那是不可能的；但不一定就抱有要积极地去占领日本，使其殖民地化的意图。当然，英国在行使武力上之所以持慎重态度，不仅仅是由于贸易主义的必然属性；而且，还要考虑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列强在对日外交上的势力均衡；以及它在印度和中国遭遇到的激烈的民族抵抗的痛苦经验。

不管怎么说，为使贸易发展能够顺利地进行，英国是希望能成立稳定的全国统一政权的。幕府不一定能成为积极推行自由贸易的政权；相反，它倒是一个障碍物。而且，当它的缺乏统治全国能力变得明显时，英国就逐渐地接近了萨长势力，同援助幕府的法国对抗起来；希望一边避免全国性的内乱，一边要在天皇（朝廷）之下，出现一个能逐步废除各种封建限制的、新的稳定的统一政权。（注）

三、从尊攘运动到倒幕运动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的领导势力是萨摩、长州等西南雄藩为中心的下级武士阶层。这些下级武士是在安政时期的改革当中，逐渐显露头角的。

日本在黑船的炮口之下被迫开国的这种情况，在武士阶级有识者阶层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安政年间（1854—59年）在幕府以及萨摩、长州、土佐、肥前、越前、水户等各藩，频繁地进行了改革。成为它的中心的，是军事上的改革；但随之而来的，

（注）关于外部压力的性质和日本的殖民地化危机的问题，例如，远山茂树の《明治维新》（岩波书店，1951）主张：外部压力在产业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由于贸易第一主义，在日本方面不偏向于暴力的排外攘夷的限度内，殖民地化危机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井上清的《日本现代史》第1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51）与他相反，则强调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侵略性和日本殖民地化的危机。

不管怎么说，为要了解外部压力的性质，不单要从资本主义的一般属性或它的发展阶段性出发，而必须要在当时东亚的国际政治发展中，来了解列强的对日政策。在这一点上，对于列强（特别是英国）来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比起印度或中国，毋宁说它的存在是具有第二位的意义。

同时，殖民地化的危机如何，也是同外部压力和日本方面的反应相对而看的，这是很重要的，还有，日本方面的领导者对这个外部压力是如何对待的？抱着怎样的危机感？这和“客观的”殖民地化危机的关系，是另一个角度的问题。

是身份低的武士们可以说作为技术者和官僚,常常被录用而充当了推进改革的角色,这是值得注意的。同时,当倍利来航之际,老中阿部正弘也打破了前例,向诸侯、藩士们諮詢对策,并录用了陪臣为幕吏等等;这就在他们中间唤起了超越单纯的藩政和幕政界限的、对“国政”的广泛关心。在这种情况下,由外部压力触发起来的民族的危机意识,强烈地要求幕府能发挥象中央政府那样的机能。

阿部死后,政局围绕着条约的敕许和将军的继嗣这两个问题的动向,使一桥派同纪伊派之间的对立激化起来。以大老井伊直弼为中心的纪伊派,从传统的幕阁专制的立场出发,对于主张在有能力、有人望的将军之下联合雄藩来担当内外危机的一桥派(雄藩主们),进行了严厉的镇压(1858——59年安政大狱);他的反动政策不久就招来了樱田门外之变(1860年暗杀井伊),幕权显著地衰落下来了。

通过这次政争的过程,朝廷在政治上的比重却马上增长起来。在整个江户时代,天皇虽不曾掌握任何政治上的实权,但在形式上却确立了这样的原则:即将军是由天皇委任大政的;幕府的统治,是从天皇那里寻求正统性的根据的。

适应这种情况,在思想上就产生了水户学的尊王论和国学的神学思想,随着对外危机的加剧,就同攘夷思想结合起来,以长州藩为中心逐渐发展成为激进的尊攘运动。但在另一方面,幕府和雄藩之间,在樱田门外之变以后,试图改变幕阁专制、以妥协和调和朝幕关系的公武合体运动,却盛行起来。1863年(文久3)8月18日之政变,是公武合体派把尊攘派势力驱逐出京都的政变。同时,在对外方面,还有1863——64年(文久3——元治元)的萨英战争、马关战争等,面临列强的武力攻击,使攘夷的方针遭到了挫折。

由于尊攘派的活动,常常超越了藩的界限,以直接虔信天皇的形式来进行的,这样却反而失掉了藩政权对它的支援,只剩下长州藩而被孤立了起来;同时,对外的攘夷方针,在以有强大军事力量自夸的列强面前,是很难实现的,等等;可以说,这些就成了尊攘运动受挫的原因。

在这以后,尊攘运动转变成为倒幕运动。二者在它的阶级基础和领导势力上,几乎没有质的差别;同时,在人事系谱上也是有联系的。但是,就倒幕运动而言,它在目标上却抛弃了无谋的攘夷方针(注),要在开国进取的方策之下集中力量去打倒幕府,为此,作为具体的方策,就是要把藩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在这个基础上图谋藩的富强化(“割据富国”),并以此为杠杆,图谋走上打倒幕府的道路。

长州藩在第一次征伐长州和马关战争中遭重创之后,藩内的保守派势力加强起来;但高杉晋作等的倒幕派却率领骑兵团等诸队举兵,夺取了藩的政权,策划了军制改革和振兴产业,同英国有了接近。在那以前盛行公武合体论的萨摩藩,也由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倒幕派,逐渐掌握了藩政的主导权,改革了藩政,在对英贸易上表现了积极的姿态。

(注)幕末的攘夷论,虽有各样的复杂因素,但就整个来看,不都是要否定同所谓“夷狄”的外国建立邦交的、盲目的排外的锁国论。在有识之士中间,有不少人持有这样的看法:同列强对抗的目的,毕竟是为了进而使国家向世界开放、向海外扩张;为此,就必须在国内实施大改革,建设能压倒列强的富强国家;同时,还强烈地反对在开国上屈服于列强的军事压力;为此,作为当前的方针,主张攘夷。

吉田松阴等人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攘夷论者,而同积极的开国进取论,是一脉相通的,从而,可以说,从攘夷到开国的转变,在思想上早就作好了准备。

这样，在1866年（庆应2）由于土佐藩的板本龙马等的居间调停，为了对抗幕府，成立了萨长联合的密约。同年举行的第二次征伐长州，以幕府的失败而告终；而且，当战争正酣时，在江户、大坂及其周围地带那样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以及石见、丰前那样的交战地区，频繁地爆发了捣毁运动和百姓一揆，动摇了幕府的统治权，暴露了它在维持社会秩序上的无能。

四、幕府的崩溃

在这个过程中成为第十五代将军的德川庆喜，在得到法国的援助之下，相继进行了幕政的改革，试图以幕府为中心来建立统一的国家。

另一方面，在反幕府势力中间，以萨长为中心的武力讨幕的方针，同以土佐藩为中心的大政奉还、公议政体的方针之间互相纠葛在一起，使政局有了进展。前者坚决主张用武力去打倒幕府；后者为了避免全面武力冲突而试图使幕府把政权归还朝廷，要在朝廷之下召开列藩会议，去收拾时局。

在1867年（庆应3）10月14日德川庆喜以大政奉还上表于朝廷。这是响应土佐藩的建议，想在日趋高涨的武力讨幕发动时，去先发制人，在名义上把政权归还天皇，但又要用列藩会议仍然去维持实权为目的。接着，在同年12月9日根据所谓的王政复古之大号令，断然实行废除摄关和幕府等、设置三职，革除了幕府派公家的职务等。这是武力讨幕派的反击；这时成立的新政府，排除了激烈的反对，要求德川庆喜辞退官位、归还领地，不久就引起了第二年戊辰战争的爆发。

戊辰战争是以鸟羽伏见之战为开端，至1869年（明治2）5月的五稜郭之战而告终，成为经过约一年半的全国性的内乱；由此，新政府把旧幕府势力一扫而光，使国内得以统一，使分裂的国家政权实现了一元化。

五、新政府的各项改革

对新政府来说，最重要的课题是建设能对抗欧美列强的富强国家，为此就要确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

但是，新政府在成立之初，是皇族、公家、雄藩士等的联合政权，它的基础可以说也不一定就那么巩固。因而，政府作为支撑新的统一国家的理念，强调了天皇亲政和尊重公议舆论。天皇亲政，是说新政府的成立就是“王政复古”，是和恢复“神武创业之始”的这一原则，联系在一起的；把只限于武士阶级的尊王思想向国民的规模扩大的尝试，一再加以宣扬了。同时，根据公议政体论的尊重公议舆论，是新政府为了调动各藩的支持，扩大政权的基础的。在《五条御誓文》中的“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中所表达的列藩会议的构想，和《政体书》中关于“议政官”（特别是“下局”）的规定，都是其具体化。

同时，政府害怕由于戊辰战争而使各藩试图加强武备，反而会加强割据体制，就策划了版籍奉还。1869年（明治2）采取了萨长七肥以及其他各藩主的建议的这种形式，开

始付诸实施了。由于这样，在名义上各藩主成了政府的行政官（藩知事），把全国置于政府直接统治之下，而实际上的效果也不过就是如此。

因此，政府于1871年（明治4）在集合了御亲兵、对局势作了应付万一的准备之后，一举断然进行了废藩置县，解除了藩知事的职务，重新任命政府的官僚为知事，进而对旧藩的区域予以大幅度的调整、合并，设定了新的行政区划。这样，到这时幕藩体制才算瓦解，“同世界万国对峙之基”才算奠定了。废藩置县的实施之所以没遇到那么强烈的抵抗，这也同在当时各藩之中，陷入严重财政困难，连维持藩都困难的不在少数的情况，也是一个原因。

在废藩置县以后，为要同欧美列强相对抗，就从列强那里引进了新的知识、制度和技术等；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各项改革，在排除了屡屡发生的士族和农民的抵抗后继续实施了。揭示四民平等的身份制度的改革，地税改革等的土地制度、租税制度的改革，以工部省为中心的殖产兴业政策的推进，学制等的学校教育制度的引进，征兵令等的一系列军事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欧美近代国家为模型，在政府的政治领导之下，有目的、有意识地予以实施的。

六、有司专制的建立

成为推进上述的一系列近代化政策的中枢的官僚机构，也逐渐地建立起来了。明治初年再三进行的官制改革，它的目的，毋宁说是在于人事上的刷新；通过这些改革，逐步地使旧藩主、公家阶层后退下来，特别是使萨长土肥四藩的下级武士出身的人占据了主要的岗位。而且，他们已经不是代表藩的利益，而是作为国家的官僚，担当起推行政策的责任了。随之，当初的列藩会议的公议舆论，逐步地一去不复返了；特别是由于废藩置县，以至于连它的意义也丧失了。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所谓“有司专制”的政府。又由于他们推行近代化政策过于急剧，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屡屡蹂躏了士族、农民等的利益，这同他们的“专制”的政治运营相结合，就惹起了激烈的抵抗。西南战争等的士族叛乱和农民一揆的频繁爆发，可以说就是它的表现。

七、总 结

如上所述，由于明治维新，日本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这个所谓“近代化”，不外就是通过引进西洋的知识、制度、技术等，使自己西洋化，建设了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

即便是那样，在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各国都成了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的情况下，那么，为什么只有日本能够避免那种情况，而实现了民族独立、建成了近代国家呢？要简单地来加以解答，这是过于困难的问题；向来就有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假设的见解。

现在仅就明治维新的问题，来考察一下它的国际的和国内的条件吧。首先，就国际的条件来谈，应该指出。掌握对日外交主导权的英国，在1850——60年代，以产业资本主义时

代为背景，采取了自由贸易主义；对列强（特别是英国）来说，比起中国或印度来，日本被认为是居于第二位的意义，军事力量都集中在那里〔按指中国和印度——译者〕了；列强的势力处于均衡的状态；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南北战争等使列强的国内局势恶化了；由于遭到印度和中国的激烈的民族抵抗，列强（特别是英国）积累了痛苦的经验；等等。由于这些，就使列强不可能〔对日本〕强行采取武力行动、殖民地化的政策。

当然，这些条件并不是单独地在发生作用，而是和日本国内的反应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即说，就国内的条件来看，江户时代的幕藩体制，是在具有中央政府机能的幕府之下，由完备的官僚组织所支撑，保持了相当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虽说是岛国的这种地理条件，但在大致确定的领土之内，居住着大致单一的民族，使用大致共同的语言；具有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市场，某种程度上发达的通讯手段，等等。这样，就使江户时代的日本，保持了如封建时代的欧洲各国，或19世纪亚洲各国（例如异民族王朝征服的清国，或几乎不存在民族统一条件的莫卧儿帝国），几乎看不到那种民族统一性。一旦面临强烈的西欧冲击，这几点不就成了这样的条件吗？即：触发了以下级武士阶层为中心的激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他们不是简单地去盲目的排外主义，而是站在民族利益之上，一边抵抗外部压力，一边吸取“西洋之艺术”，由自己去打破幕藩体制，并建立近代的统一国家、民族国家。

如果不正确地去认识日本的这种特殊性，而把西欧的发展路线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评价明治维新，或者把它同中国、印度的情况随便地加以比较，我认为那都是没有意义的。

译自井上光贞编《日本史入门》（有斐
阁丛书，1976年版），第166——178页

陈 本 善译

关于明治维新史观的演变

田中 彰

两种维新史观

“草莽”维新史观 明治元年（1868）旧历8月初一夜里，京都被秋雨淋得湿漉漉的。在那秋雨中的京都的一个角落，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有一本小册子正在撰写出来。这就是被叫作《复古论》的书。笔者是叫作小洲处士的，不知是何处的浪人。

说起8月，那正是戊辰战争的战火正向着东北、北越扩展，是战争正酣之时。在那种形势下写出的小册子，对当时还在进行中的维新的意义，是这样看的：同建武中兴不同，这次的复古，是由“草莽发起勤王之说”而发生的，从而，即使“上面的意志”发生变化，但如万民之心不变，那就没有恢复武家政治的道理。

这位笔者并没有否认眼前所展开的维新变革，是由萨、长、土为首的各藩的力量所推进的。但是，尽管如此，他却把维新的原动力看作是“草莽”。因而，他认为下述说法是错误的：诸侯是以王政复古为名要夺取天下的。他大胆地断言道：即使大名们别有用心，但由于变革的根源在于“草莽”，就已经不能任凭他们自由行动了。

对这个“草莽”，是应把它看作是幕末的志士呢？是豪农商呢？还是偏僻村庄的农民们呢？由于这一点而将对明治维新的看法有所不同；但至少可以说，他对维新的看法是站在接近于民众的立场上的。和这种看法有联系的，是在幕府垮台的前一年，即庆应2年（1866）8月，在江户小石川的一份请愿书，描绘了要实现的社会，那将是四民都各安其业，连一个乞丐、盗贼、游民都没有，是万民和平的“世界第一好国。”对当时处于最高潮的农民一揆，被叫做“救世”的这一请愿书，可以说是反映了民众“救世”所揭示的理想的。

王政复古的维新史观 但是，以萨长为中心的戊辰战争的胜利者们却不是站在这种民众的立场上，来评价维新的。他们很早就提出了只有以天皇为中心的王政，即王政复古才是维新的本质的看法。早在庆应3年（1867）12月9日的《王政复古之大号令》中就已采用了那样的观点。看一下第二年明治元年3月由长崎审判所向民众发出的《御论书》，就可以了解维新政府是要民众怎样去理解这次变革了。

“这里所说的日本这个国家，乃是天皇从天照皇太神宫那里继承来的。天皇才是日本国自古以来一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主人。这恰好就象太阳在天上那样。”

在揭示了这些话之后，又说：要想当国王的德川庆喜的谋叛，由于被揭露而失败了。因而就象往昔那样，“由天子来施行政道”。明治2年（1869）2月的《对奥羽人民的告谕》中也说：“一尺之地，一人之民，皆为天子所有。天子乃是日本国之父母。”向民众灌输了王土王民的思想。

这就很明显了，同上述的“草莽”维新观，是站在完全不同的立场上的。

在维新内战高潮中，就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维新观。那么，这两种维新观在以后又是怎样发展的呢？

复古史观的强化 明治2年（1869）4月4日发出的诏书，下令当时的辅相三条实美为总裁，以主持修史事业；要求他把《三代实录》以后久已中断的官撰历史，继续编辑出来，“以迅速正君臣名份之谊，明华夷内外之辩，以扶植天下之纲常。”

早在该年3月，在原和学讲谈所内就设立了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根据这一修史诏书，继古代“六国史”之后，开始了修史事业。明治5年（1872）5月成立了国史编辑局，接着经过太政官历史科，8年4月又成为修史局。在那以后，经过迂回曲折，在21年（1888）将它移交帝国大学管理，不久被叫做史料编纂挂（现在东大史料编纂所的前身）。

以它为中心编纂并完成了《复古记》298卷。时间是在明治22年12月，前后经过了16年又8个月的岁月。在此期间，作为副产品编出了编年纲要《明治史要》（明治9年出版）。这部《复古记》，编辑了自庆应3年（1867）10月14日大政奉还起，至大体完成平定东北、东征大总督解任的明治元年（1868）10月28日为止的王政复古的记录。是要根据这部记录，来说明为王政复古的功绩和反抗的事迹的。

如果说《复古记》是以太政官为中心，要通过戊辰战争的记录来评价维新胜利者的话；那么，自明治16年（1883）4月起，以宫内省为中心，在岩仓具视主持之下开始编纂的《大政纪要》，就是反映了明治政府由于当时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而产生的危机感。因此，它就从正面提出了王政复古史观，用这个观点来评价维新，进而对民权运动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的。

“夫大政在皇室，乃我建国之本体也。为臣下者一旦专擅大权，则时势变矣。

今已七百年，乃改一时之变，恢复三千五百年建国之本体。大业于是得成全，与天祖之神敕灼然相契矣。”

这个维新观斥责民权运动活动家们，为“不逞之徒”、“奇歪曲学之徒”，非难民权论为“诡谲辩诞之说”（“假冒和荒诞之说”）、“横议暴言”。这是互为表里的。从站在王政复古维新观的立场上的明治政府方面来看，只有民权派才是蹂躏维新的精神的。

但是，这部书由于岩仓具视之死而中断了。

那么，被这部《大政纪要》骂倒的民权派，对维新又是怎样看的呢？

民权派的维新史观 以明六社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家们，很早就接受了欧洲思想的影响，同勤王或佐幕的名份论不同，持有“天皇同人民决非异类”的天赋人权论观点。他们认为：“人民自由”的扩大，乃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性，并要用这种观点来评价维新的变革的。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之概略》（明治8）认为：过去的历史书，“不是日本国的历史，净是日本政府的历史”，给与了猛烈的批判，并提出了这样的主张：即说明文明“只存在于日本的国家和日本的人民之中”，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因而，他们就按照上述观点，从人心的归趋上去探求维新的原因。

他们虽然不采用王政复古史观，但是这些启蒙思想家们对于明治政府却是基本上加

以肯定的。

可是，接受了启蒙思想家影响的自由民权运动活动家们，却把明治政府看成是专制政府，同它处于对立的状态。这是由于政府是以藩阀为中心，图谋私利的缘故。“夫今日之政府，既非文明也，亦非守旧也，它只是惯用两手，专图私利之政府也。”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领导人植木枝盛就是这样明确宣布的。

植木对维新的评价，就是从这里产生的。他在明治10年（1877）9月，恰好是在西乡隆盛在城山倒下去两天之前，在《海南新志》上刊载一篇论稿，把明治维新看作是“近时之一大改变，是明治第一次改变”；同时又规定，那是“政府的改变”，但却不是“政体的变革”。就是说，德川政府是打倒了，但代替它的仍然是“独裁的政府”。因而，他说：政府虽然改变了，但人民的权利和利益却没有增加，自由也没有扩大。在这里，他说：为了“改革那个政权，使之成为君臣共治，废除政府之独裁，使人民得以掌握政权”，就成了他提出“第二次改革”的理由了。

植木是对维新进行最严厉批判的一人，但一般说来，自由民权运动活动家们的维新观，由于维新的改革摆脱了封建束缚而使人民自由得以扩大，并要从五条誓文那里找到要求开设国会的根据；在这个限度内，可以说对维新的意义，是给与很高的评价的。于是，在对维新和对明治政府这二者的看法上，就有着一定的改变乃至完全割裂开来；这样，就把现在的明治政府看成是从维新之初的“改进主义”转变为“守旧”的了。只少可以说，这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看待维新的；它是要从维新那里找出以后取得政权的根据的。

中江兆民等人编辑的《东云新闻》的社论《维新革命的精神》（明治21年5月）中，也贯彻了那种观点。该文说：只有这个“公议舆论”才是“维新革命的精神”所在；推进它的人是“草莽浮浪之徒”。还说：可是，当他们一跃而立身出世，成为“维新之功臣，国家之元勋”时，就使当初的精神湮没了，“导致了武断专制之弊风。”

刊登这篇社论时，为明治21年（1888），那正是发布宪法、开设国会的前夕。曾一度陷于停滞的民权运动，由于大同团结运动而出现了再度高涨的形势。即使这是民权运动的余烬，从初期国会中的民党（野党）抨击政府当中，还是可以看到的；但在思想上，它却采取了平民主义的形式。

平民主义的维新史观

竹越三义和德富苏峰 平民主义是什么呢？三义·竹越与三郎在明治24——5年（1891——2）出版的，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系维新史《新日本史》中，有如下的叙述：

“平民主义，就是要把社会的快乐和光荣分配给最大多数的民众，把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分担给每一个人；随着社会的进步，使每一个人的品格也不断提高了。它不仅对政府来说，主张要民权；而且，社会的组织也要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上是社会共和主义；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行不通的；政治上的民权主义，乃是联结各阶级的关键。”

竹越的说明，还有很长的一段话，但他说：“总之”，可以把平民主义归结为“维

新以来，更单纯了，即在法权主义上反对专制，所有的分子都受它管束，这就是最终的目的。”

他是按照这个观点看待明治维新的。就是说，他认为：维新的改革，目的在于实行自由平等的大义，在于皇室接近人民。他断然说：由维新成立的新国家，“毫无疑问，应该是更坚固、更平等、更自由、更有实力。”他说：明治维新既不是复古的革命，也不是理想的革命，“由于它只是来源于不堪于现在痛苦的人们，因此可以给它起名叫作真正是漠漠茫茫的乱世革命”。

对这个平民主义的维新观，苏峰·德富猪一郎早在明治19年（1886）出版的《将来之日本》中，就已经表达出来了。苏峰把维新的改革，看作是“受内外之刺激一时之结合，由于外压和内迫终于呈现出这一种壮观奇状的”。他认为，它要把武备社会一举变成生产社会，把贵族社会一举变成平民社会打下了大基础。

他赋与维新以这种意义，作为他的这种主张的背景的是：“所谓国民者，实为居住于茅屋中之人。我相信，如果不使此国民得到安宁、自由、幸福，则国家一日也不能存在。”这里的所谓国民，当然是指“平民”，用他的话来说，其中还包括“田舍绅士”、“中等阶级”，总之，是意味着独立小生产者阶层。

在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即明治20年，苏峰创立了民友社，发行了《国民之友》。那是以这个阶层为依据，是为了向作为日本近代化承担者的这个阶层进行号召的。因而，苏峰等人的平民主义，同当时的藩阀政府的保护政商政策，处于激烈对立的状态。

人见一太郎的“第二次维新” 在那种限度内，平民主义对于政府的王政复古维新观，是站在批判的立场上的。苏峰在《国民之友》上分析指出了明治维新中具有维新和复古的两种因素，并把当时以政府为中心的正在抬头的保守主义的渊源，从明治维新中的复古因素那里去探求，因而才高喊“第二次维新”的到来。把苏峰的主张作为小册子的标题的，是明治26年（1893）出版的人见一太郎的《第二次维新》。作为自大江义塾以来就同苏峰一起，又是民友社同人的人见，说了如下的话：

“尊王攘夷乃雨也，公议舆论乃雷雹也。第一次维新实为雨与雷雹一起降落也。公议舆论之进步，乃政府之进步也。公议舆论之退步，乃政府之退步也。明治之初二年之内，政府如鸟之飞舞。自明治二年至十年，毋宁说退步矣。若说有进步，则如蜗牛之匍匐前进也。自十年以后，即完全退步败走矣。若要强说有进步，是有进步矣，然则为向背后方向前进矣。”

对维新之后，他的看法是这样的：第一个时期的“革命的性质”，到〔明治〕2年至10年的第二个时期，逐渐地淡薄下去，到10年以后的第三个时期，则完全丧失了。认为明治藩阀政府的现状，同维新当初是相反的，是往后面前进的。这样的平民主义维新观，乃是民权派维新观的延长，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平民主义维新史观的转向 但是，这个平民主义维新史观却转向了。那是与初期议会中的民党，它的组织、体质在转变中同明治政府妥协起来，以日清战争为转机一举而成为对外强硬运动的活动，为政府大陆侵略政策所吸收这一点相适应的。

苏峰开始提出这样的主张，即只有日清战争才体现了维新的精神，由于到这时，作

为平民主义所依据的中等阶级，在现实中分化为寄生地主和佃农、贫农，苏峰等人的进步主义的立脚点已趋于崩溃的境地。于是，在平民主义的旗印上，就涂上了帝国主义的色彩。

苏峰在明治26年（1893）的著作《吉田松阴》，是“作为革命家的松阴”来加以描写的。可是，到明治41年（1908）的改订版时，初版本的“革命”的话，全部改换成“改革”；“作为革命家的松阴”那一章，则全部被削除。不仅如此，代替同和加布尔、加里波的并列的19世纪意大利统一运动代表人物马志尼相比拟的“松阴和马志尼”那一章，新插入了“松阴和国体观”、“松阴和帝国主义”、“松阴和武士道”等。引用的马志尼语录：“革命是为了人民，因而不可不依人民之手来完成。吾人之全部宗旨，简言之就在斯一语”来论及松阴的初版的姿态，到明治40年代从名到实都转向了帝国主义；苏峰已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化了。

这时的日本史学界，正如山路爱山所说的那样，分成两种：“以兴感为主的，是平民的”，和“以考证为主的，则是贵族的，或者是专门的”。但属于前者的苏峰的维新观，由于完成了这种转向，是有很大大意义的。那就是，接近民众立场的维新观开始崩溃了，为下述的天皇制维新观的确立，起了打好地基的作用。

天皇制维新史观的官制化

旧大名的不满 旧大名各家联合起来，要建立可以说是为了搜集和保存幕末维新史史料的团体“史谈会”的，是在明治22年（1889）；它的核心是旧萨摩藩。加入这个团体的，有长州和土佐、水户；还有岩仓、三条两家也汇合了进来，而且，还请皇族为总裁，直属宫内省之下，以便继建武中兴之后，来编纂“明治中兴之史料”。但结局，是只限于搜集了故老的维新史谈，出版了《史谈会速记录》罢了。而把被当时的藩阀政府驱出政府之外的旧大名网罗在一起，以各藩大名家为单位来编辑幕末期“国事执掌（繁忙）”的历史；而且是站在藩阀政府之外，从宫内省那里开展运动，这是具有特征的。在过去不过是他们的家臣的这一伙人，如今面对着政权的华贵宝座，从被那里排斥出来的旧大名的立场出发的；从那里可以看出来，是具有某种抵抗的性质的。

藩阀政府的畏惧 但是，不能说掌握政权的藩阀势力，对此没有特别加以介意的。而且，那也不意味着藩阀势力对搜集维新史料是漠不关心的。

巡游欧美归国后的金子坚太郎，在明治23年（1890）7月，向当时的首相山县有朋和宫内大臣土方久元提出了《设立国史编纂局之议》。提议要在宫内省设立国史编纂局，以“详考大政维新之起源及沿革。”

看到金子计划的伊藤博文，以“不合情理”为由而加以反对。伊藤反对的理由大致如下：

“你应很好地考虑一下，你难道不了解我们长期在内阁的苦心吗？现在如果要搜集维新史料的话，可以说是正当要以萨长提携来顺利地通过〔明治〕23年帝国议会难关的时刻，万一在萨长之间稍微使感情交恶的话，那么，此次议会就很难预料了。如你也知道的那样，自明治初年以来，——远从蛤门之战以来，——萨长之间